

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发展与转型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City Research

黄亮 田星星 盛垒

Huang Liang, Tian Xingxing, Sheng Lei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 作为国际城市高端形态的世界城市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 形成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既有的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遭遇困境, 世界城市的发展与相应研究也出现转型倾向。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背景, 在梳理世界城市主要观点的基础上, 着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传统世界城市研究进行了理论反思, 并提出创新正在成为塑造世界城市新维度的观点。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cit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as a high-end shape of international city in recent years, and a series of rich theoretical results has been formed. Howev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world cities which took the financial capital as its core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tend to transform. In view of above background, the paper focuses on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world cit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up the main opinions. In addi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nnovation is now becoming a new dimension to construct the world city.

关键词: 世界城市; 理论发展; 理论转型; 创新

Keywords: World Cit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国家软科学重大公开招标项目 (2012GXSD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41001083) 联合资助

作者: 黄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博士后研究人员。450108993@qq.com

田星星,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硕士研究生

盛垒, 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引言

当今世界, 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经济社会空间的重构产生巨大影响^[1], 生产的地点和过程越来越依赖于跨国权力和资本的超级流动与结网状况^[2], 导致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迅速崛起, 并成为控制和协调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中心^[3]。这使得作为国际城市高端形态的世界城市^[4]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形成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然而, 在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纽约、伦敦等城市所遭遇的发展困境使人们对世界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产生困惑。事实证明, 建立在全球金融市场之上的全球经济平台的根基并不牢靠^[5], 这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既有的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是否仍能无往不利的深入思考, 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也随之出现转型倾向。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将首先回顾近年来世界城市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 阐述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内涵与形成机制; 随后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切入, 对传统世界城市研究进行理论反思, 提出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世界城市体系; 最后基于以上论述, 提出创新将成为认知与塑造世界城市的新维度, 并且对于世界城市竞争力的保持与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1 世界城市的提出与内涵特征

1966 年, 彼得·霍尔 (Peter Hall) 将世界城市定性为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都市, 是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 并论述了世界城市的主要内涵, 包括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 专业人才聚集中心, 信息汇集和传播中心, 大规模人口中心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以及娱乐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等^[6]。科恩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 提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协调和控制中心的观点, 并运用“跨国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两个指标分析了若干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7]。

弗里德曼 (Friedmann) 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 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指挥与控制中心, 并主要从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国际化组织及国家中心、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主要交通枢

纽、人口规模等7个方面论述了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8]；随后，弗里德曼又补充了世界城市还是国际移民集散地的观点^[9]。

沙森^① (Sassen) 更加关注世界城市发达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她通过考察位居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将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中心，具备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 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2) 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二者已经替代制造生产部门成为主导经济部门；(3) 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4) 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2]。

基于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卡斯特 (Castells) 于1989年提出了信息化城市 (information city) 的概念^[10]。他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空间的地方性日益转化为流动性，即产生了“流动的空间” (space of flow)，而世界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控制着全球信息的流动与进出。与以往对世界城市基本内涵的解释不同，卡斯特赋予其动态和联系的内涵^[11]。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于世界城市概念与内涵的解释都突出了其基本属性，即是否作为一个资本积聚地和充当组织、控制生产的分配及流通的角色^[12]，具体表现为全球城市网络的主要节点，全球战略性资源、通道和产业的控制中心，全球跨国公司和银行总部的集聚中心以及全球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集散中心等。

2 世界城市的主导功能与形成机制

2.1 世界城市的主导功能

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生产者服务包含的内容虽然繁多，但中心只有一个，即围绕着资本运作的金融业^[13]，因而，国际金融中心历来被认为是位于体系顶端世界城市的首要经济功能^[14,15]。国际金融中心既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也是世界城市体系中一个特别的分支类型。里德 (Reed) 在此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通过指标收集与多变量分析，勾勒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层级体系，其中，纽约、伦敦被认定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16]。

世界城市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全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中心^[15]。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作用下，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向全球范围扩散——制造工厂向边缘地带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对生产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则向大城市集中。在这种生产和管理空间分离的过程中，少数城市凭借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生产服务网络和高效的指挥系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总部机构，进而具备了管控与策划全球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城市在信息网络建设中同样领先一步，成为全球通信网络的主要节点，发挥着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与作用。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把生产、消费和服务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网络的过程。在信息时代，全球性支配功能和过程通过网络组织起来，新的通信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使得世界城市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充当主要节点，支配着信息时代全球的地理结构^[17]。

除却上述经济功能之外，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霍尔就将政治因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依据，认为世界城市应当是全球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以及国际性组织所在地，并在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强势地位^[6]。

2.2 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

弗里德曼将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归结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以公司内部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式展开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8]。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适宜的生产区位，将决策、资本运营等环节集中在少数城市，并以此为基点来协调和控制全球生产和市场，进而导致世界城市的出现。在其后续研究中，他特别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吸引以跨国公司总部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是因为世界城市代表了其所影响的区域的经济实力及其统领该区域与全球经济链接的能力^[18]。因而，注重城市地方内部力量的内生式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其进行全球性参与是构建世界城市的正确模式^[19]。

沙森认为全球城市的形成力量来自于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的控制功能在少数城市的持续集聚^[2]。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的地域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产生了一种空间分散化而全球一体组织的经济活动，具体表现为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与此同时对生产活动的控制不断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上述过程赋予了主要城市一种新的战略角色，即全球城市。

卡斯特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他认为信息是世界经济新的战略性资源，世界城市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先进的通信网络服务。因此，获得世界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并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获得最终胜利，是世界城市形成的关键所在。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10]。相应地，智能建筑、电信港、光纤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已成为正在浮现中的信息化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将对城市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在世界城市体

① 即萨斯基娅·萨森 (Saskia Sassen)。

系中的地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20]。

国内研究方面，沈金箴以东京作为研究案例，归纳了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分别为：(1) 以创新为源泉的雄厚综合经济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基础；(2) 国家信息中心的角色是东京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关键；(3) 立足于国家战略高度是东京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保证；(4) 再塑全球竞争力是东京保持其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手段^[21]。杨一博和宗刚回顾了纽约作为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指出地理区位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纽约成为世界城市的主要因素，并认为城市凝聚力的缺失将成为纽约维持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障碍^[22]。杨培雷从内外动力两个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其中内部动力来自于城市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以及信息化时代赋予城市在国际层面相互联系的世界属性，外部动力则来源于城市当局的政策安排与城市规划定位^[23]。

3 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转型

3.1 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反思

李健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传统世界城市研究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其在某些方面存在薄弱环节：(1) 传统世界城市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经验基础上，强调其国际经济枢纽的控制和服务功能，仅仅关注了金融、房地产等高端服务业对于世界经济的统领作用；(2) 更多关注了位于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高端城市，忽略了作为整体存在的全球价值链中其他环节的空间镶嵌，尤其是忽视知识与技术控制力在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3) 仅讨论了全球化过程对于世界经济格局及全球城市体系发展的推动，却无视自下而上的本地化过程的内生发展力量^[24]。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景象。不少城市逐渐认识到经济基础多元化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支持制造业振兴，并积极寻找服务业的新增长点^[5]，这极大撼动了既有的以 FIRE^①产业来评价与塑造世界城市的思维基础。屠启宇和苏宁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为了规避由单一性服务经济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世界城市需要更加注重城市经济结构的均衡性与多样性^[25]。同时，在社会力持续介入到全球化过程^[5]，全球土地与水资源约束日益显著，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城市文化亟需可持续发展等背景下，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也突破了原有的经济领域，进一步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呈现出世界城市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特征。

其次，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日益深入，由于具备绝对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按照全球价

值链的不同环节被功能性地配置在具有不同优势的空间与地方之中，形成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过程不仅造就了世界城市，对其他城市也产生巨大影响^[26]，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可以通过嵌入价值链中的不同价值区段（如总部管理、品牌营销、研发设计、制造组装等）而获益，从而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之中^[24]。因此，在未来世界城市及其体系研究中，将进一步体现全球价值链之空间内涵的完整性。在关注集聚了跨国公司总部、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顶层城市同时，也应将集聚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城市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之中。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尤其需要关注因集聚和控制了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另一侧——高端的技术研发环节——而成为全球新产品和新技术创新源、高科技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地、具有研发服务与创新功能的国际城市，如硅谷、筑波、班加罗尔等（图1）。

在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层面，肖亦卓指出西方学者大多注重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等外部因素对世界城市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在理论建构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作为前提条件的城市内生发展水平极易被忽视，以及存在忽视城市所在区域的历史、区位和制度特性的倾向^[27]。张庭伟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跨国公司总部与世界城市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世界城市本身的经济统领地位才是其吸引企业总部的原因，而并非由企业总部造就了世界城市^[28]。所以，世界城市的节点地位及其腹地的地缘经济总量是因，公司总部迁入是果。较多的公司总部会进一步加强世界城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链接能力，进而取得更大的成功，两者存在互动关系。作为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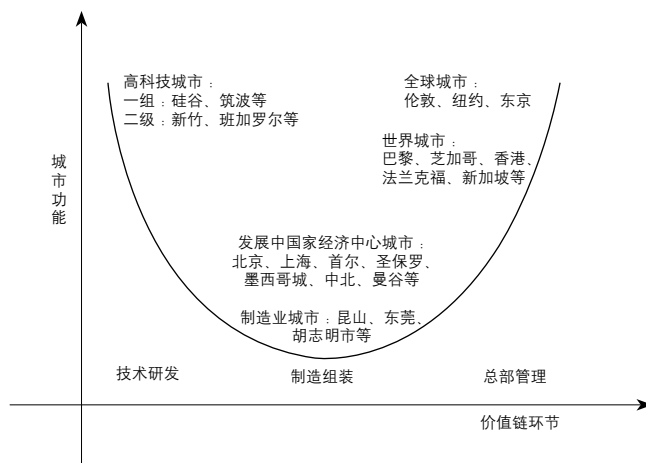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世界城市体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4]

① 是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等高级服务业的英文首字母缩写（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

司，其全球搜寻与各国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有关，反映出经济活动本地化的特点^[29]。由此可见，世界城市的形成实质上是全球化与本地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累积地方竞争优势的内生式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导引其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内外两方面的融合发展才是构建世界城市的正确路径选择。

3.2 创新：世界城市塑造的新维度

早在1994年，宁越敏就撰文分析了世界城市崛起的客观规律，他认为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周期性经济长波引发主导产业的更替，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发生转移，进而推动了世界城市在新的区域内形成^[30]（表1）。可见，世界城市的崛起依赖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济与科技力量的推动^[31]。

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整体复兴主要是依靠硅谷、波士顿128公路等地高科技产业经济的崛起。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步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产业主体^[24]。到了21世纪，城市经济在从以制造业为中心向结构轻型化和经济服务化转变的同时，日益表现出显著的以知识信息为中心的“创新经济”特点^[33]。创新资源加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创新竞争阶段。在新一轮经济长波与技术革命正在酝酿的关键时期，哪座城市能够掌握新一轮产业兴起的核心技术与创意环节，开发出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哪座城市就能占据新兴主导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控制全球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脉搏，从而确立以及进一步保持其世界城市的地位与优势。因此，建设世界城市，首当其冲就是要发展创新经济、建设创新型城市，在继续强调世界城市资本控制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向以科学、技术、教育及各种艺术家为中心的“提升人类创造性的城市经济与社会系统转变”^[33]，使创新成为推动世界城市功能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表1 经济长波与世界城市的形成

长波周期	时间（年）	主导产业	新的经济增长重心	世界城市
第一次	1782—1845	采煤、纺织	英国	伦敦
第二次	1845—1892	钢铁、铁路	英国、美国	伦敦
第三次	1892—1948	电气机械、汽车、化学	美国、德国	纽约、伦敦
第四次	1948—1990	电子、航空、航天	美国西部、日本	纽约、伦敦、东京等
第五次	1990至今	网络、生物工程、新能源	美国、金砖四国 ^①	大批国际城市崛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32]整理

另外，在新经济下，创新已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或功能。而世界城市之所以在世界上地位凸显也正是得益于其拥有突出的创新职能，具体表现为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老产品及服务的新方式，新标准及操作方法；涵盖了金融工具衍生、多媒体应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生物科技、环境保护以及文化创意、产权保护制度等包括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在内的诸多方面；而世界城市的创新职能也将极大地强化其在全球城市体系的中心性以及领导地位。

纽约、伦敦、新加坡、首尔等不同层级的世界城市近来相继出台了2030规划，对城市的长期发展实施战略部署，规划中所呈现的产业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世界城市的产业选择趋势（表2）。可以明显看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

表2 不同层级世界城市的2030战略规划产业目标

层级	城市	规划名称	2030 产业发展目标导向
首要层级	纽约	更绿更美好的纽约	注重绿色环保，开发绿色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新能源产业（风能、太阳能等）、节能环保产业（电动汽车、节能楼宇等）、绿色产业（绿色食品等）等将得到快速发展
	伦敦	更宜居的城市	强化金融业、航运旅游业、商业、文化创意产业、咨询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走向集约化、复合化、融合化道路
	东京	首都圈巨型城市群	重点扶持和培育支撑大都市发展的产业，如城市机能活用型产业，社会问题解决型产业，信息传播产业和信息家电等产业，以创新城市型产业带动日本整体经济发展
次要层级	巴黎	确保21世纪全球吸引力	强化巴黎大区的服务经济支柱产业；在具有世界规模的第三产业市场中集聚总部选址，并形成强有力的科技研究能力
	法兰克福	网络城市	通过企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资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金融、企业服务、通信技术和媒体、贸易物流和交通管理服务业；广告、公关、软件和游戏等创新经济将获得巨大发展机会；利用博览会带动酒店、商业、旅游等产业发展
	首尔	全球气候友好城市	投资450亿美元用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重点发展氢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绿色建筑、LED照明等10大绿色技术，建立规模1700亿美元的绿色市场，具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新加坡	挑战稀缺土地	鼓励和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的发展；依靠尖端技术，实现高附加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将新加坡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
	香港	亚洲国际都会	改善相关软件，拓展人民币业务范围，提升金融市场素质；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办公环境；利用亚太航运中心地位，大力推进贸易、物流和航空服务业发展；发展旅游会展业，推动贸易、零售等商业快速发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造适宜人才发展环境
	台北	生态城市	重点发展绿色环保、文化、信息、商业、医疗服务产业，其中绿色环保为重中之重；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尤其是地铁周边地下空间，发展地铁商业街，形成集约化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2]整理

① 金砖四国的概念由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于2001年首次提出，指四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分别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其人口和国土面积在全球占有重要份额，并且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BRIC由这四个国家英文名称首字母所组成。

变化以及突破资源瓶颈,低碳绿色化的环保、新能源、纳米、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成为世界城市未来主要的产业选择方向。与此同时,城市科技研究能力的培育以及附加值较高的金融、咨询服务、商业以及文化创意等服务性产业发展亦得到高度重视。可见,打造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世界城市,正成为各国占领新一轮产业制高点进而控制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要方式^[34]。

4 结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FIRE产业和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出现了难以为继的现象,引发了本文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与研究转型的理论思考。在对世界城市的内涵特征、主要功能和形成机制等理论成果进行简单回顾之后,笔者着重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对传统世界城市研究进行了理论反思。

笔者认为,未来世界城市及其体系研究将更多体现全球价值链之空间内涵的完整性,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当重点关注因集聚了价值链另一侧高端研发环节而成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地和知识生产中心的具有研发与创新功能的国际城市;同时,要重视城市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规避由单一服务业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世界城市并非一个值得夸耀的头衔,而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具备一定优势的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世界城市的建成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积淀,尤其需要大力发展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以及附加值较高的文化创意产业等,以夯实世界城市的成长基础。另外,要注重发挥城市本地化特性,保持与彰显城市个性与文化传统;确定累积地方竞争优势的内生式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其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坚持内外融合发展的世界城市成长路径。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将成为认知、评价与塑造世界城市的新维度,建设创新型城市成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世界城市金融资本控制力的同时,应当重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创新功能的培育,使创新成为推动世界城市功能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UPI**

参考文献

- [1] 吕拉昌. 全球城市理论与中国的国际城市建设[J]. 地理科学, 2007(4): 449-456.
- [2] 丝奇雅·沙森. 全球城市: 纽约伦敦东京[M]. 周振华, 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3] 熊世伟. 国际化城市的界定及上海的定位[J]. 现代城市研究, 2001(4): 4-7.
- [4] 段霞, 文魁. 基于全景观察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2): 61-71.
- [5] 张庭伟.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4): 5-11.

- [6] Hall P. The World Cities[M]. London: Heinemann, 1966.
- [7] Cohen R B.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M]. Dear Michael, Scott Allen, eds. New York: Methuen, 1981: 287-315.
- [8]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69-83.
- [9]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M] // Knox P L, Taylor P L,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0]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 City[M]. London: Blackwell, 1989.
- [11] 周振华.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9.
- [12] 黄苏萍, 朱咏.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J]. 城市规划学刊, 2011(5): 11-18.
- [13] 张庭伟. 制造业、服务业和上海的发展战略[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3): 2-8.
- [14] 宁越敏.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城市和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J]. 城市问题, 1991(3): 2-7.
- [15] 周振华, 陈向明, 黄建富, 编. 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16] Reed H C. Financial Center Hegemony, Interest Rat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M] // Park Y S, Eassayad M, eds.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 [17] 谢守红, 宁越敏. 世界城市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04(5): 56-66.
- [18] Friedmann J. World Cities Revisited: A Comment[J]. Urban Studies, 2001, 38(13): 2535-2536.
- [19] Friedmann J. 规划全球城市: 内生式发展模式[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4): 3-8.
- [20] Moss M L. Telecommunications, World Cities and Urban Policy[J]. Urban Studies, 1987, 24(6): 534-546.
- [21] 沈金箴. 东京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经济地理, 2003(4): 571-576.
- [22] 杨一博, 宗刚. 纽约世界城市发展道路对北京的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12): 79-84.
- [23] 杨培雷. 全球性城市形成机制、结构与功能特征探析——兼谈上海世界性城市建设中的几个问题[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3(2): 18-23.
- [24] 李健.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 2011(3): 20-26.
- [25] 屠启宇, 苏宁. 全方位把握世界城市发展新趋势[N]. 解放日报, 2012-04-09, 第14版.
- [26] 周振华. 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J]. 社会科学, 2006(10): 17-26.
- [27] 肖亦卓. 世界城市形成因素的讨论[J]. 北京规划建设, 2010(5): 21-23.
- [28] 张庭伟. 制造业、服务业和上海的发展战略[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3): 1-7.
- [29] 王辉慈, 等. 创新的空间: 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0] 宁越敏. 世界城市崛起的规律及上海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J]. 城市问题, 1994(6): 21-26.
- [31] 徐颖. 历史演进与功能定位: 世界城市研究的网格化分析框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6): 82-85.
- [32] 侯百镇. 城市转型: 周期、战略与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5): 1-12.
- [33] 王桂新. 转型与创新——上海建设世界城市持续驱动力之探讨(摘要)[R]. 北京: 北京论坛, 2012.
- [34] 屠启宇, 苏宁, 张剑涛, 等. 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本文编辑: 张祎娴)